

美国之后

五十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



著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之后/陈燕妮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 5

ISBN 7-5063-1872-5

I. 美… II. 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546 号

美国之后

作者:陈燕妮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李颖明

版式设计:英 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650 千

印张:31

插页:6

印数:10001—20000

版次: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版次:2000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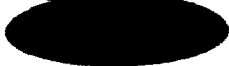
ISBN7-5063-1872-5/I·1857

定价: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吴世明

吴世明背景：

1963 年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1968 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分配到建筑公司担任技术员，并曾在建设银行当过公务员。1978 年考取浙江大学土木系研究生。

1980 年 1 月进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岩土工程硕士学位，一年之后在同系攻读博士学位。

1983 年底回国，进入浙江大学土木系担任讲师。

1986 年下半年重回美国做博士后研究。

1987 年再次回到浙江大学土木系担任副教授，同年年底被晋升为教授。1988 年初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助理职务，四年后成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在学术上曾获国家教委、浙江省科技及教育成果奖等十多个奖项。1996、1997 两年以论文《波在土中传播》、《软土地基上大型机场跑道建造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三等奖，并获浙江省科技一等奖。现为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1998 年起担任同济大学副校长。

吴世明录音：

比较而言，我考大学的时间挺早的，早到中国当时还没有什么基本建设。我是学土木的，这个专业在当时中国的生活环境中显得有点没用。实际情况也真是这样，学校那时的各门学科中，“土木系”时常被排在后面，学校里也不怎么重视。从学生的角度来说，这门学科大家也觉得没什么东西好学，毕业后面临的工作环境也相对艰苦，所以，这门学科在当时相当冷门。

而我却是以第一志愿考取浙江大学土木系的。当时的我真没想到，如今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建设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这门学科录取的分数已经很高了，学生毕业后工作也好找，从业人员的收入也高起来了，甚至有些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来的教授都和我们的研究生说：学你们这行的人最好不要去美国、加拿大发展，这一行在那里实在没什么工作好找，反而现在的中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

我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也使得我后来的一些工作经历变得很奇特，我在建筑公司和银行都工作过，搞过设计，搞过施工，也搞过管理。

1978年，我考取了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学的当然还是土木。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应该知道，我1978年的研究生应该是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了。

在考完研究生还未正式通知被录取时，我又被推荐考了出国考试，考取的人能够获得公费资助在国外上学。我当时的考试成绩不错，最终考上了。当时的浙江大学还属于中国科学院系统，所以，我考上之后也就被算做了中国科学院方面派出的公派留学生。在此之后我一边上课一边强化学习外语，这种生活一直过到1980年我去美国读书。

我在美国进的是密西根州立大学，这在美国的大学中算是

一个相当不错的学校。

当时,中国的留学政策刚刚开始施行,留学在中国社会上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排在我前面的中国公派研究生我不知道有多少,反正,要到美国报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公派研究生中的编号是“八十四号”。如果这个“八十四号”真的是按顺序排列的,算起来我实在可以算是中国到美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了。

那时,因为中国刚刚开放不久,美国的大学里来自中国大陆的留美学生人数很少,我们大学里的大陆研究生只有四个人,其他各种类型的访问学者有十几个人,那一段留学生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大家在美国的生活都很艰难,但大家彼此很团结,相互间也非常乐于帮忙。留学的日子里大家都很穷,谁的钱都不多,再加上我们研究生的课业也很繁重,因此生活显得相当紧张。

我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两个星期了,这给我造成了一些心理压力。我仍记得我的美国教授第一次把我带到他的课堂里去时,我真的什么也没听懂,幸亏我的英文在阅读方面底子还不错,因此后来开始正式上课时,我一遇到听不懂的东西就回来看书,我在美国的学业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硕士学位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拿下来了,这样的学习速度在美国学校里算是相当快的了,在此之后我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一向这样,读书进度很快,这很像我办事的态度,喜欢高效率,不爱拖拉。

那时候,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挺爱国的,我在密西根州立大学里曾经是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课余时间常常为大家举办各种活动。我们的活动中既有大的国庆庆祝,或者举办一些中国的文化节、电影节等等,也有日常接待由国内来美的新学

生等琐碎工作。那些年,美国很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都有这样的好传统,老生似乎有天然的义务为新学生接站、安排住处。

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后来发展到有一百多位会员,一度成为美国高校内相当有规模的中国留学生会。国家教委曾经有一个慰问团春节到密西根大学慰问,我就把大家组织起来,甚至把周围大学里的中国学生也召集起来,大家一起来迎接这个团。

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些场面,也还记得看到如此热情的欢迎场面以及如此庞大的接待规模,慰问团里的很多人都感动得不得了。在远离祖国的日子里大家真的非常想念祖国,我们把慰问团接来,然后看他们为我们演唱《我的祖国》,这样的歌曲一唱起来,同在异邦的大家全都流了泪。

当我把我的博士学位读完之后,也就是在 1983 年年底,我回国了。认真算起来,在美国,我呆了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后来,也就是在 1986 年底,我又去美国做过博士后研究,1987 年又回国了。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两次去美国,但两次都回国了,有些人一直对我的举动不能理解,但我觉得自己选择回国的道理很简单、很合理。我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我第二次去美国之后一定不会再回来了,而且那次我走之前,我在国内的研究生也都转给别人带了,人家对我的研究生说:你的导师都走了,你们还不赶快另找门路?

结果谁也没想到,我还是回来了。

我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夫人也随我一同去了那里,和我坚决主张回国的态度相比,她比较不愿意回国。我当时跟她说,如果你真的不愿回去的话,我可以在美国给你找一点事情做,“至于我,是一定要回去的”。

最后,她还是放弃了留在那里的打算。

其实那一次我选择回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当时带的研究生在我走后确实面临非常为难的处境,他们是慕名来读我的研究生的,如果我完全不理睬他们的学业安排,自己留在美国再也不回去了,这样做我心里别扭。

我百分之百地觉得自己应该承担带好这些研究生的责任。

但是,直到我回国的时候,中国也还没有开始大兴土木,我的专业那时在中国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作为。说良心话,我当时凭的只是一个直觉,觉得中国未来一定会让我在专业方面做出成就。也可以说,靠着这样的信念,我为自己做了选择,而且对自己的选择一直毫无悔意。

我的回国,在浙江大学算是从美国学成回校的第一人,在我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归国学者,比如我们的老校长路甬祥就是从西德回来的。那么,如果全面地算“从海外回来的人”,我想我应该算是第二个。

谈到我的回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显得比较私人化。那就是,如果拿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比,我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中国文化,美国的文化我可以欣赏,也可以理解,但如果让我终生生活在美国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我想我会很痛苦。那种文化始终让我觉得和自己不很合拍。

我这个学理工科的人和很多学理工科的人不太一样,我在过去的生活中接受了非常多的中国文化知识,多少年来一直相当喜爱中国的人文文化,比如说我一直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在初中的时候我其实还曾经设想过自己未来一定要考美术专业,去做一位职业画家。但是尽管我很喜欢中国文化,当年我还是没去读文科,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数学基本上一直都是考一百分的,父母告诉我可以把文学作为业余爱好来看待,我直到今天都

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

当然，作为我这样的一个人教授，在中国算是很出格的，因为我不是传统想象中那种理工科教授的样子。在传统的环境中，我居然还能存活下来而且还存活得不错，有些奇特。

至于留在国外，说实话，那时候中国国内能出国的人还不多，我如果想走“留在美国”这条路实在太方便了。不论那时还是现在，如果仔细想想，其实不难发现，很多学理工科的人在美国发展得都如鱼得水。以我的专业来讲，在当时的美国也绝对可以如鱼得水，但当时在美国呆着的我还是有很多不好的感觉，一是感到自己总是客居在外，心理感到不舒服；二是当时中国人在美国整体经济和政治地位都不是太高，留在那里，社会地位的压抑会让人心理感到更不舒服。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那就是，当年如果有一个美国的学校主动来聘请我去工作，我或许有留在那里的可能，但是实话说，我从来没为自己寻求过这样的机会。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的回国，在我个人来说，似乎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但是，回国之路并不是一步非常好走的棋。

回想起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的确面临着很多来自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

我刚回国的时候工资差不多是八九十块人民币，后来我的工资提高到一百三十块钱，对此，我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了。记得刚提工资的时候，我还和家里人讲过：“我现在的工资已经一百三十块了，这个数字很高。”当时的美金和人民币的兑换率还是一比二点几，中国和整个国际方面的金融交流还没有启动多少。

在人际关系上，直到我回到浙江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的根

基根本不在这里。我在国内其实只读了一个本科,在考上研究生的时候也只读了几门课程,然后学了一些外语就出国去了,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美国拿的,我的导师在美国。靠着这样的条件,我和一直在本校读完研究生后毕业留校的教师比,绝对算是“外来人”。面对这样的人事局面,从国外回来的我知道自己必须从头做起。

在专业方面,我现在从事的土动力学专业在当时的浙江大学本来是没有的,因而面临着必须自己从头开创的局面。这对我来说可以算是一个更大的考验。现在,我的土动力学在全国已经是很大的一块牌子,这完全是靠我们自己通过多年的奋斗打拼出来的。

回国之后,我抱持的最初信念就是从一点一滴做起,不讲条件。当时,对于回国后的工作安排我的想法其实非常现实,我觉得自己从国外回来从最低限度来讲,当一个普通讲师总还是可以的吧?事实上,我后来在浙江大学真的是从讲师一点点做起的。

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讲师安排”,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委屈。相比之下,现在很多在美国学习过、拿到了文凭的人就不那么好安排了,他们如果动了回国的念头,总是对国内的接收单位说:如果你不聘我做教授,我就不回来。

同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我对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说法不敢恭维,我觉得如果你那么强调必须有现成的一个位置,你就别回来。因为,人不能对自己没有信心。

真的,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从讲师做起”没什么不应该,人生何必那么计较。我一向不计较,在生活上也是如此。

现在,浙大从国外回来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尤其是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都会带“几大件”回来,当年我回国的时候什么也没

有带,人家问我为什么没带东西回来,我对他们说:很简单,我的钱用完了,都干别的事花掉了。

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我虽然没钱,但我舍得花钱。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全美国到处旅游,这让我看到了很多美国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从来这样认为:钱花在这样的地方,我买到的是经验,这能让我终身受益。八十年代的中国,生活环境还是很艰苦的,但我觉得自己回国之后对物质的追求心情淡泊,我觉得自己怎么生活都无所谓。

我临回国的时候,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说他自己“坚决不回来”,我和他一直在一起学习,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是考试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人,他则属于考试成绩不那么好、但非常聪明的那种人。他后来比我稍迟一点也到了美国,他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在美国生活,和我的观点完全相反。

直到今天我们都还非常要好,但我们还是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现在他已经在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工作很久,年薪大概已经拿到八万多到九万美金了。他夫人也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女儿也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每次到美国去都一定会去看他,而且常常住在他家里,我个人在美国的一些事务也会委托他办。我想,如果我当年不坚持回国而选择留在美国的话,如今的状况也会是他今天的状况了吧。

好在我回国之后业务上发展顺利。回国之后,我虽然是从讲师做起的,但几年后就被升为副教授,然后是教授,再然后,我为浙江大学的老校长路甬祥当了四年的校长助理。这样的一个晋升现象发生在我身上,其实在浙大里面是相当特殊的。我是从一个普通教师直接升为校长助理的,这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事情。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校方是怎么选中我的,当时的我

实在还很稚嫩，业务上也还拿不出今天这么多的学术成果。我在业务上开始走向高潮、开始获奖基本上是从1996年开始的，这距离我自美返国的日期而言已经相差十几年了。

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如果说我有不成功的方面，那就是在人与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有的人在中国是靠自己的官位生活的，这类人中有一部分人相当擅长制造纠纷，除此之外，他们一旦离开了官位，就立即变得什么都不是。

我刚回到中国来时，很多人都这样告诫我：“你要改变你的方式，必须变得不那么直率，这样才能适应国内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说我根本不要做任何改变，我相信我的性格这样下去是可以的，我相信我是代表潮流的，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坦率才能真正交往。退一步说，我的做法即便现在可能还不太合潮流，但是一定合以后的潮流。我坚信，今后人与人的关系一定是以坦率为本的。

刚回国的時候，我在很多方面都经受过议论，有些人认为我回来后没有创造出什么新奇的东西，甚至有人曾经散布我是美国间谍之类的说法，对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加理会。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伤害不了我，我绝不会因此而一筹莫展，也绝不会晚上睡不着。当然，重要的是我心里比较坦然，这一点，只有豁达的人才能做到，否则不行。

之所以能这么淡然地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波折，如果让我诚实分析，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美国文化在我身上的一种体现。我觉得美国人是比较直率的，而且人与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真诚，可惜在中国不是这样。

但我还是耐住了十多年的寂寞，心里非常平静。我早就有这样的功底，早已养成这样一个有益自身的习惯：外面怎么波动，我依然心情平静。

我爱写毛笔字，我写字也用的是这种耐得住寂寞的功底，我知道唯有这样，字才耐看。

对于周围的风风雨雨，我已经做足准备。

我知道，即便有风有雨，我仍可以在风雨中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美国，大家老是谈论谁挣多少年薪的话题，对这类事情，我没多大兴趣。

在浙大，我的月薪在工资单上写的数额是“一六七八”，这个数字很好记，也不会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条件差。我是搞土木工程的，我的经济来源中还有一些不是来自担任“副校长”职务的钱，我觉得自己活得真的挺好，已经让我心满意足。当然，我不是大款，但在国内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这样说，只要是需要的东西，我已经能够达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的水平。

我现在再去美国的时候，去到我当年留在那里的同学家做客，看到他们家里买的东西都还不是最高档的，我跟他们说“我在中国买东西从来都是买最好的”。在这方面我不往下看我往上看，对我来说几乎所有的物质需求，我都买得起。

现在在国内，技术人员可以自己搞科技咨询、搞工程，我们所里目前一共有二十五人的教职员编制，我们课题组只占了其中的六个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可是去年我们的科技经费占全部经费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我们所里去年一百五十五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我们就占了一百零五万。当然，这些钱折合美元并没有多少，但是我们是在中国生活，这个数字实在已经足够了。

更何况，即便我的财务状况已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我对生活还是属于那种要求不是非常高的人。我会对任何事情都做努力争取，最终能够拿到什么我都不在乎。一如我当年回国的时候就没有抱有太多的期望，只是想回国来当一个一般教师。

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活得很好，不是非要到美国才能活得好，只要你能持续地努力。其实，对于美国的生活我相当能适应，我可以举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穿西装可以穿得非常像样，而很多人在美国呆了很久照样西装穿不像样。这就是我已适应了的一个方面。而且，美国的各种音乐我也很爱听，直到现在，我依旧非常喜欢，远的不说，就在昨天，当我感到累的时候还放了美国音乐来调节自己。

但即便我在美国哪怕在这些小事上都能理顺，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回国。

作为浙大教授，我带着二十多个研究生，其中博士生十六个、硕士生七个。我带学生的做法是美国和中国做法的一个结合，应该说，美国整个一套教学方面的东西我学得挺成功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如果和美国的情况相比较，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很多弊端，尤其在理工院校学生完全不知道数理化之外的知识方面，更让人感到担忧。最近，我还和我的一个博士生谈到“中国目前的理工科学生知识面实在太窄”这个问题。我的这个学生也说，他在自己整个高中阶段什么都没学，就学了数理化，考取了大学之后又学的是这个，所以他接连断裂了好多年学习其它知识的时间和机会。

我想中国的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中有很多人的情形和他一样，就是为了拿到一张进入社会的“门票”而考进大学之门的，他们前半段生命其实全部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张“门票”，这很可悲。

现在，虽然国内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了，但由于我们现在的师资等有关方面力量有限，因此解决起来不是件容易事。

其实说穿了，“技术”在文人当中并不被认为是文化，只被认

为是一种技术。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理工科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可言,很多人连文章都写不好。当然这样的人如果到了美国,反而可以活得非常自如,他们会觉得任何文化都是全新的,都可以适应,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懂过中国文化。

实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在我周围就存在不少,如果问起我周围的一些教授每天都干些什么,他们会说“看电视啊”,这样的生活和农民没有什么差别。

我现在还经常到美国去跑跑,去年去了两趟,今年因为国内事务过多,暂时去不了。在我的所有朋友当中,我是回美国次数最多的一个。

每次去美国,我都会去看看当年的老朋友们,大家相聚一下。我当年在美国的同学中也有留校任教的,但是大部分都走的是去美国公司工作的道路,他们如今的生活都不错,很优越,买的房子都是二十五六万美元的中等价位房,房子的样子也非常漂亮、时髦。他们的房子一般都很大,周围空气新鲜,草地也护理得非常好。

在这些外在环境方面,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没法比,真的,如果你现在到我浙大教工住宅区的家看看,我们住房的外观看上去简直一塌糊涂,我分到的虽然是三室一厅,但其实是很破的房子。有人说要看看浙江大学的教工房屋状况,我说“看看我家的房子就知道整个学校的情况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教授,职务上也是个副校长,但是我的房子状况还是让我觉得和留在美国的那些同学没法比。

但我并不羡慕留在美国的同学,我和他们比不了的不外乎就是在房子上,至于其它方面,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没什么不好。我在国内需要用车的话可以随便叫车,如果我不当副校长了,我也可以随便叫出租车,我付得起这个钱。

说实话,我始终觉得,我们这样的人真正想要赚钱,就必须在中国发展。以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如果你在中国有足够的名气,人家就会来找你去做工程咨询、找你解决工程上的问题。最近,我有一个学生也从国外回来了,比较美国和中国目前的总体生活情况,他还是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工作收入比在国外高。他深有体会地说:在美国赚到的是一点辛苦钱,而且每年赚个五万、八万已经算是到头了,还得交很重的税。

当然,相隔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已经不再为是不是该回国的问题而争论了,人不可能再返回到过去。但我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我一直都可以随时去美国发展。真的,如果我后悔,有很多机会仍旧可以让我重返美国。

话说回来,我对自己的选择不后悔,并不表示说我会反对别人去美国。如今,我手下的研究生中有很多人都想出国,我也鼓励他们出去,我说“你们应该出去看看”。之所以对学生做出这样的鼓励,是因为我深深知道:美国的那几年生活,让我整个人有了很大改变。我是在美国读硕士和博士的,然后又做过博士后研究,这些经历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生活状况,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思想。

我现在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生活中的很多做法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很多好的方面。我曾经说过我在教学上的很多做法都用的是美国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我在处理导师和学生关系方面。我现在的学生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是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之间关系有点像是父子,我现在在学校里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力求随和,尽量和他们相处自然,处成朋友关系。

出国留学这么多年来,我了解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完整教育系统,中美两地的教授在专业水平上没有什么不同,

差别在于美国的教授思想可能更开阔一些,人也随和。这也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大概也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最好的学生都愿意到我这里来。这样一来,我的学生们普遍素质不错,我稍微加以培养,他们就可以挑大梁了。

与此同时,我也非常注重美国人在科研过程中注重的“团队精神”,在这方面,中国人就有很大的弱点,和别人合作往往生怕自己吃亏,这样一来,最终大家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提醒我的科研团队:我们必须一起做事情,我离开你们不行,你们离开我也不行。单人做事情可以做成,但是做成的事只会是小小的,只能搭个鸡窝。一个人慢慢奋斗,五年十年也做不出什么大东西,科研没有成果,到时候连升教授都很困难。而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做事,事情就可以做大。齐心协力可以搭一个大楼,各人有各人的功劳,各人能够得到各人的好处。

好在这么些年来,我的学生们对我这个观点都很认同,我们就是——一直这么做的。就拿我们获奖的成果来说吧,在署名中排在我后面、名列第二名的科技伙伴只有三十五岁左右,升教授已经两三年了,现在已经被评上省里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也当上了。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齐心协力拿到一个奖,大家都有名可出。

但是有些搞科研的人就不能把握这个方向,生怕排名排不好,生怕自己吃亏。我不怕吃亏,我觉得无所谓。我也吃过亏,但是我很坦然,吃亏就吃亏。

回顾我过去走过的这些路程,尤其是我从美国回国之后所走过的道路,我觉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在业务上,各种“道”我都力求占据,因为我不怕失去,这样反而得到的更多。我知道,我们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一定能成功,我们不是一批蠢人,我们会自己为自己安排好前途。很多人留在美

国不回来的原因主要是看中了在美国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很少有人会看中回到中国之后得到的精神利益,而我则比较重精神。当年我回国的时候给自己的期望就是努力去做,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成什么样,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够做成什么样。但我可以说的是:现在的我,什么都不缺。

现在的我感到生活得很充实,我这样的人留在美国,我想除了生活条件优越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来。

选择回国,让我的人生别有洞天。当然,未来的多少年之后我也许还会到美国去住住,人生中什么安排都可能出现。

曾经有的人问我女儿:“你怎么评价你爸爸?”

我女儿说:“我觉得我爸爸很神秘、很莫测。”

我觉得我有实力,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虽然有时候会身不由己,但我还是力求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有时候我告诉我的研究生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题目就是“怎样把握自己”。我告诉他们:你能把握自己,就一定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让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要想做到把握自己,自己就首先需要有能力。实际上,一个人的做人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不断提高自己素质的过程。一个人短期吃亏可以,但更需要一个长远的不吃亏战略。

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再重走一遍人生,我可能还会选择这样走。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清高。

我觉得我的人生因为淡泊而清高。